

唐诗的历史想象

张彦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唐诗的历史想象

张彦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诗的历史想象/张彦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8

ISBN 978-7-5203-4884-3

I. ①唐… II. ①张… III. ①唐诗—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8400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 潇
责任校对 刘 娟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219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广西一流学科·中国语言文学”经费资助成果、
“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桂学研究院”经费资助成果。

序

我通常不给他人著述作序，其间原因固多，但最主要的还是自己对之并无专门的研究，所述便难免流于客套。记得当年自己博士学位论文即将出版，兴冲冲地去找导师启功先生求序，不想先生一口回绝。腆颜再求，先生正色道：“不是我不愿意给你写序，实在是我对玄学所知有限，褒贬或恐失当，故难以从命。”于是我只好作罢。此事不仅使我对启功先生的处世为人多了一分了解，而且自然形成了不轻易给他人著述作序的习惯。以是之故，当张彦博士学位论文获得出版资助，请我作序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婉拒。然而，在翻看张彦博士学位论文修订稿之后，我觉得似乎还是应该写上几句，因为在张彦的文稿中，我依稀看到了当年写博士学位论文时的自己。

张彦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时指导的最后一个博士生。自1999年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后，我先后在中文系文献学和古代文学专业唐宋文学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但说句实在话，无论是文献学还是唐宋文学，我都未真正具备指导博士生的能力，只是学科评估需要而将我置于该学科点充数罢了。由于相关专业知识储备、研究动向的先天不足，很难真正做到因人择题，因题定文，而主要是凭借自己写作博士学位论文的一点经验指导学生。这样一来，学生论文在选择论题、确定研究思路时便自觉不自觉地受我影响，追求自上而下，以论带史的研究范式。正如张彦在其论文《后记》中所写：“张老师的著作《玄妙之境——魏晋玄学美学思潮》，从哲学的本体论、价值论和方

法论的逻辑结构出发，建构魏晋玄学与诗学的关系，当时给我很深的启发，唐代历史题材的诗歌是诗、史、哲三位一体的，我也希望能够将唐代诗歌与史学，以及关乎历史的哲学思考的关系阐释清楚；也希望能够像老师一样，建构起论文整体的逻辑分析体系。”

张彦博士学位论文以“唐诗的历史想象”为题，这是我和她一起确定的。她的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唐代咏吴越争战历史的诗歌，我希望她在此基础上予以扩展，将唐诗中的历史题材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对象。鉴于此前有关唐代咏史、怀古诗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所以当时的想法是超越“咏史”“怀古”的简单分类，在一个更为开阔的背景下来考察唐诗与历史的关系。相应地，诸如唐人的历史意识、唐人的历史知识谱系、唐人的历史取向等便成为论题的应有之义；而唐诗中的历史并不就是唐人书写的历史，如何实现历史向诗的转化，或者说，唐人如何援史入诗，化史为诗，也自然成为论文必须观照的对象。正是循此思路，张彦的博士学位论文确定了其章节布局，将“唐诗的历史想象”这一总论题具体化为若干专题。

这样一种写法确有某种优势，它能够有效地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有助于全面考察相关问题，探寻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成因。当然这种写法也对研究者提出了挑战，要求研究者具备打通文史的知识结构、高屋建瓴的理论视野，并且需要处理更多的文史材料。虽然张彦表示自己尚未达到导师对论文题目的期望，没能阐释出哲学的内涵，但从眼前这部经张彦补充修订后的文稿来看，她不仅尽力去做了，而且交上了一份很好的答卷。论文前三章分别讨论唐人的史鉴意识、唐人的历史知识谱系、唐人的历史取向，从文化层面对唐诗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唐代历史题材类诗歌的繁荣原因做了充分的阐述。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对于上述问题，张彦并不止于浮泛地概述，而是尽可能将问题落到实处，尽可能详加辨析。如对相关概念、术语的界定，区分历史书写与文学创作的异同，思理缜密，文脉井然；又如指出史部典籍在形式体例上以编年、纪传等编纂方式影响了唐代诗人的咏史诗创作，类书实为连接历史与诗歌的重要环节，“三史”进入科考客观上促成了唐代士子对

历史的熟悉，以及有关唐人汉朝情结、六朝兴亡观的讨论等，也都是作者的见解，有助于深化对问题的认识。至于第四章讨论唐诗历史想象的功能和技巧，第五章分述初、盛、中、晚唐诗歌历史意象化之大概，更是深入唐代历史题材诗歌的内部构成，游走于史实和诗境之间，对其转化生成机制、基本范型做了较为充分的说明与辨析。

毋庸讳言，此种写法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宏观把握是其所长，那么微观考察则为其短。尽管第五章采取了以时段分节的策略，具体讨论了李白、杜甫等诗人历史意象化方面的特色，但总体而言，书中论及的重要诗人大多散见各处，对于那些希望深入了解某一诗人历史题材创作的读者，难免会造成某种缺憾。此外，举证式的论述方式，客观上也会导致难以对某些经典之作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分析。令我欣慰的是，对此缺憾张彦已有觉察，并在进入广西师范大学任教后有意识地增强文献学方面的训练，在明清广西地方诗歌总集的研究中取得了可观的成果。相信假以时日，张彦定能超越旧我，集良好的理论素养与坚实的文献基础于一身，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张海明

2018. 12. 18

目 录

绪 言	1
一 选题提出	1
二 文献综述	2
三 研究对象	3
四 研究内容	14
第一章 史官文化影响下唐诗中的史鉴意识	17
第一节 唐代统治者诗中的史鉴意识	17
一 总结历代兴亡，巩固创业鸿基	18
二 见盛须得观衰，居安则要思危	20
第二节 唐代史家诗中的史鉴思想	22
一 史家的历史题材诗歌概观	23
二 史家责任：借史讽谏君王	28
三 历史哲学：探寻天人之际	31
四 历史经验：从政处世之道	32
第三节 唐代诗人的史鉴精神	35
一 见乱思治，总结历史规律	35
二 咏史明志，寻找生命范式	40

三 牒谱精神，树立立身之本	41
第二章 唐人的历史知识谱系与唐诗对历史的想象	44
第一节 唐人的历史知识谱系	44
一 史部正史：唐人历史知识来源的主体	45
二 史部野史：唐人历史想象的启蒙	50
三 经部典籍：唐人据经探史且据史谈经	53
四 子部典籍：唐人历史典故的积累	60
第二节 唐人对正史知识的接受与诗意想象	63
一 正史之中尤崇“三史”	63
二 “三史”之中尤尚汉史	67
第三节 唐人对野史和类书中历史知识的诗意想象	79
一 唐人对杂史的诗意想象：以唐诗对《吴越春秋》的接受为例	80
二 唐人对杂传的诗意想象：以唐诗对杂传“老莱子”故事的接受为例	84
三 唐人对类书的诗意想象：以类书的“老莱子”典故为例	87
第三章 唐代诗人的历史取向与文化原因	90
第一节 唐代诗人的汉朝情结及文化原因	91
一 唐代诗人的汉朝情结	91
二 “唐承汉统”政治思想的影响	94
三 祭祀汉代先王贤臣的礼制熏陶	96
四 唐人对汉朝文化的理性选择	98
第二节 唐代诗人的三国观及文化背景	101
一 诗人的君主观：以咏曹操为例	101
二 诗人的名臣观：以咏诸葛亮为例	105
三 诗人的正统观：对正史的传承	109



四 诗人的天人观：三国史论影响	111
第三节 唐代诗人的六朝兴亡观及文化背景	115
一 兴亡因素：君主人才、地势王气	116
二 败亡原因：“近小人”与“务奢靡”	122
三 兴亡感叹：历史与生命的衰亡同构	125
第四章 唐诗历史想象的功能、模式与技巧	128
第一节 唐前诗歌历史想象特征概说	128
一 先秦两汉：诗歌想象历史的叙事性与颂赞性	129
二 魏晋南北朝：诗歌想象历史的咏怀性	133
第二节 唐诗历史想象之功能	137
一 以史言志与因史抒情	138
二 借史讽今与借古喻今	145
第三节 唐诗历史想象之文本模式	150
一 历史传记式	151
二 历史论赞式	159
三 历史情境式	163
第四节 唐诗历史想象之技巧举隅	167
一 浓缩式想象	168
二 连缀式想象	170
三 填充式想象	172
四 换位式想象	174
五 虚构式想象	177
第五章 唐诗的历史意象化	181
第一节 唐诗历史意象化概述	181
一 历史意象与历史意象化	182



二 历史意象结构与组合的方式	186
三 唐诗历史意象的功能	189
第二节 初盛唐诗的历史意象化	192
一 初盛唐诗历史意象化概说	193
二 李白的复合结构和凭虚构象	195
三 杜甫的意植象中与借象达意	199
第三节 中唐诗的历史意象化	202
一 李贺的历史意象陌生化	203
二 刘禹锡的意深而境生象外	209
第四节 晚唐诗的历史意象化	218
一 杜牧的意到直陈象翻新	220
二 李商隐的用意曲折象密集	223
结 语	230
一 历史想象之于唐诗的艺术魅力	230
二 较前代发展变化及对后世影响	233
三 唐代诗人历史想象与史家历史想象比较	234
主要参考文献	236
后 记	245

绪 言

一 选题提出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拥有浩瀚的历史典籍，是重视修史、传承历史、反思历史的民族；中华民族也是诗歌蔚为大观的民族。史与诗是描述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在重史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古典诗歌很早就与史结合，取材于历史典籍的记录，对历史人事想象加工，抒发历史哲思，呈现出“咏史”“怀古”等诗歌类型和历史典故等修辞样式。诗歌对历史的涵容，从简单的诗体史录或史论，到历史因素的典型化和诗境化是随着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而逐步完善和成熟的，诗歌中的历史不是过去人事的再现，而是诗歌创作主体想象性地赋予历史人事特殊含义的象征。诗歌对历史的想象是中国古典诗歌创作非常重要的一种艺术手段。

唐代诗人在民族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审视历史的视野空前扩大，他们接受历史知识，反复吟咏并阐释一些相同题材的历史事件，将时代的文化底蕴、自身的人生经验和特殊情感融入诗性的历史言说，生成诗歌深厚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意蕴；同时唐代诗人掌握了将史与诗融合的有效方式，想象历史或浓缩，或填充，或连缀，或虚构等，将历史知识转化为诗歌的历史意象，形成特定的意义指向。因此，研究唐代诗歌中的历史因素如何变成具有题材范式和艺术范式的诗意象征，有助于我们考察唐代诗人的创作心理和历史意识，



总结唐诗想象历史的艺术思维，并在古典诗歌发展流变过程中，认识唐诗历史想象的特殊价值。

二 文献综述

学界将历史题材的古典诗歌分为“咏史诗”“怀古诗”等来进行研究，是延续了古人的文体分类，按照《文镜秘府论·文意论》的经典定义，咏史诗是“读史见古人成败，感而作之”的诗歌，怀古诗是“经古人成败（之地），咏之”^①的诗歌；方回《瀛奎律髓》设“怀古”类，类序认为“怀古者，见古迹，思古人”^②，是说怀古诗以历史古迹为诗兴之触发，更重抒怀，与咏史诗有别，但其实在古人那里咏史诗、怀古诗、咏怀诗的界限不甚分明，往往同一首诗中“咏史”“咏怀”“怀古”的因素兼而有之，这种分类具有中国诗学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此现代学者从各自研究角度出发，提出了“咏史怀古诗”“咏古诗”“览古诗”等名目，对“咏史诗”“怀古诗”定义的内涵和外延理解不尽相同^③，但大多将二者都纳入研究范围，实际上的研究对象是历史题材的诗歌。

迄今为止，唐代历史题材诗歌研究已取得可观成果。^④

第一，唐代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围绕着少数诗歌大家进行，如对李白、杜甫、刘禹锡、李商隐、杜牧等诗人咏史、怀古作品创作背景的考证，思想内涵、情感内蕴或艺术风格、诗法特色的研究。另外，盛唐吴筠，晚唐许浑、

① [日] 遍照金刚（原驱弘法大师）撰，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8页。

②（元）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③ 雷恩海《咏史诗渊源的探讨暨咏史诗内涵的界定》（《贵州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一文认为应以咏史诗来涵盖怀古诗，持广义咏史诗的概念，因为怀古诗是咏史诗发展中的一体，怀古诗将诗与史完美结合，而有些艺术成就高的咏史诗已经可以归入较宽泛意义上的怀古主题一类。刘卫英、王立《怀古诗的诗学本质及其精神史意义》（《求索》1998年第6期）一文认为怀古诗是历史题材诗歌的最高艺术样式，所以可以把它们统归于“怀古诗”的范畴内。

④ 关于咏史、怀古诗的研究现状，前人已有较完整的总结，可参见赵望秦、李艳梅《中国古代咏史诗百年研究回顾》，《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赵望秦、潘晓玲《唐代咏史怀古诗百年研究回顾》，《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冯傲雪《新时期唐代咏史诗研究综述》，《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刘沧、温庭筠，以及唐末胡曾、周昙、汪遵、孙元晏等大量创作历史题材诗歌的诗人也进入研究视野。

第二，综合梳理唐代及唐前的咏史诗、怀古诗风貌，研究者尤其注重系统总结唐代咏史诗、怀古诗的发展历程和渊源流变^①。尤其对数量最多的中晚唐咏史、怀古诗进行了有深度的社会文化心理探讨。

第三，对以吟咏特定历史人物、事件或古迹为题材的诗歌进行专题性梳理，从而透视唐代诗人的集体记忆和文化心理。按歌咏人物分，最热的莫过于对咏昭君诗的研究，此外关注较多的是咏李杨诗、咏诸葛亮诗；按歌咏地域分，研究者对古都金陵题材的诗歌关注较多。

在上述研究成果之余，历史题材诗歌的研究仍有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从个案研究来看，集中于有限几位诗人；从系统研究来看，虽出现了一些专门探讨某一时代的咏史诗、怀古诗的论著，但又在很大程度上选题重复，缺乏创新；从专题研究来看，热点问题研究较为完备，新的专题很少有人踏足；从研究方法来看，学者多从诗歌的风格、体式、美学、结构、心态等方面予以解析，而从社会历史观念、诗歌历史意象上论述的不多。为了弥补学界研究的不足，突破类型学研究的局限，这里不再拘泥于咏史诗、怀古诗的范围，将所有以历史为题材的唐诗作为研究对象，多角度梳理唐诗中历史因素的来源及史与诗结合的艺术范式，总结唐代诗人历史观念和社会普遍历史观念，包括史家历史观念的区别，总结有唐一代诗人的历史文化心理，望能丰富此前学人对历史题材诗歌的研究成果。

三 研究对象

本书将以历史为题材的唐诗作为研究对象，即将唐诗中与唐前历史或晚唐诗人现实生存视野之前的唐代历史^②相关的诗歌都纳入研究范围，只要是由

^① 杨恩成《论唐代咏史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一文，对唐代咏史诗的发展历程给出定位：初唐是草创期，盛唐是奠基期，中唐是成熟期，晚唐是繁荣期，此后研究者基本按此说。

^② 称为“诗史”的杜甫诗歌：安史之乱、李杨题材的诗歌等不在讨论范围内，这些是有史笔“直录”精神的诗歌，而晚唐诗人对他们生前的当代史，安史之乱、李杨的歌咏之诗则纳入研究视野。



历史上的人、物、事、地等引起情感体验、艺术想象或历史哲思的诗，不论历史要素以怎样的形式在诗歌的语言结构中呈现，都包括诗歌的历史典故。

1. “历史”的含义

若要围绕唐诗对历史因素的融合展开讨论，那么首先要界定清诗与史的关联性，即二者在怎样的层面上具有相通性，在此基础上才能理解诗对史的运用和想象。

“历史”一词大致有三种含义：“一指过去的事，二指对过去的事的记载，三指人们意识中的过去。”^① 第一，历史是已经发生的曾客观存在过的往事，即“史实”；第二，历史是对过去客观存在往事的记载，也就是“史录”；第三，历史指人们意识中理解的过去，即被人们所认识和理解的历史知识或历史观念，即“史识”，这种被建构的历史知识已非历史事实本身。“史实”是不能触及的唯一，但同一个“史实”的“史录”和“史识”却有很多种；“史录”可以体现出史家的“史识”，先在时代的“史识”积累又影响史家“史录”的书写。总之，在本书中，历史的三种含义都将被我们使用。

在我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中，“史”的内涵不断丰富和扩展，但“史”的含义很长时间都停留在狭义的“记事者也”的层面上，即历史记录。中国古代所谓的“史”意思大致包括两种，第一，“史”可以代指史官或史职，如“良史”，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② 第二，“史”指称过去朝代编成的史书或当朝编记的实录，“史”就是以文字来记载先祖事迹的典籍。清末龚自珍甚至说“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③，把一切文字记载的文化典籍都看作历史记录；章学诚总结古代学术史，有“六经皆史”的命题，认为后代学者将“记事”者称为“史”，将“言理”者称为“经”，实是不知“六经”也是一时之史，是先王记事政典，包括《诗经》也是“史”。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史与诗紧密相关。

① 宁可：《什么是历史？》，《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第145页。

②（汉）许慎：《说文解字》卷3，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③（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古史钩沉论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页。



2. 诗与史的关联性

广义的诗与史的关系是中西方诗学都关注的问题，这一问题探讨两种不同文化形态在本质、功用、写作等方面的异同，即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本书所谓“诗与史”是狭义的，专指诗歌和历史的关系，明确二者的关联性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融合历史因素的先决条件。

第一，诗与史同源。远古时代的史官属于巫官，是沟通天人的占卜者和社会活动的记录者，是最高的知识分子和文化权威；而最早的诗歌也产生于巫祝祭师沟通天人的歌舞。先秦时代的先民崇拜祖先，信神祈福，《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其祝史陈信于鬼神。”^①“祝”和“史”分管巫官的职能，据《说文解字》，“祝”主管迎神降神等祭祀活动时的赞辞歌诗；“史”主管记事和文饰，都是向神灵表达诚恳的信任和爱戴。可见诗与史皆孕育于远古巫术文化，诗与史同源而生，后来渐渐分化，诗更加抒情言志，史则掌书记事。

第二，史官不但是历史的编纂者，也是诗歌的编录者或创作者。“史”在我国古代学术思想领域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梁启超先生说：“周礼有大史、小史、左史、内史、外史。‘六经’中若《诗》、若《书》、若《春秋》，皆史官之所职也；若《礼》、若《乐》，亦史官之支裔也。”^②可见，传统的重要文化典籍皆是史官编录或著述的，史官了解国家政治的得失，除了编纂历史，也通过采诗或作诗，来向上传达民情，达到讽谏君王、干预现实政治的目的，如《诗》三百，大多是“瞽史”采集民间歌诗所得。史官文化作为文化权威深深影响了后世诗歌创作，后世有些史家也是历史题材诗歌的创作者。

第三，历史成为诗歌歌咏的素材。历史经典是传承文化的基石，每一代的知识分子都要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获取历史知识，从小开始阅读《史记》《汉书》等史学著作，历史是他们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成为他们创作的源泉，历代诗人对历史故事的引用和再创作不断发展与成熟。

^① 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33页。

^②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5页。



第四，史与诗有相同的社会表达功用。唐代刘知几评论《诗经》《楚辞》说：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①

刘知几认为诗与史的关系是“文之将史，其流一焉”，诗与史同源同流，以诗歌为主的文学艺术和历史都是益教化的有效工具，都可以察古知今、借鉴兴亡，都具有扬善惩恶的道德功用。刘知几以“良史”的标准评判诗歌，只以史家眼光看待《诗经》和《楚辞》，没有强调其抒情言志的特点，而凸显了其秉笔直书、保存历史的价值。孟子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②，可见孟子在观念上也将诗、史合一而论，史与诗都承担着道德教化的社会功能。这种观念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的意识、史的观念不断向诗的领域渗透，使诗自觉地担负起史的功能。

第五，诗与史相通的语言要求。诗与史的语言差别，一为有韵之文，二为无韵之文，诗人追求语言华美流畅、生动韵味，史家追求简省、朴素，但好的诗歌和史书皆离不开辞简意丰的内涵表达。刘知几探讨史家编写史书的语言要求时说：

既而丘明受经，师范尼父。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扞毛而辨骨，睹一事于

^①（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史通通释》卷5《载文第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

^②（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8《离娄下》，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标点本，第226页。